



## 中外人士解读全球人权治理

## 中国式人权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路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先藕洁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也为各国发展人权提供了不同的路径。什么是真正的人权?东方人权观和西方人权观有何不同?中国在推动国际人权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6月14日至15日,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之际举办的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上,多名中外人士给出了他们的见解。

##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

2021年年底,新华社就人权治理相关问题开展了一项覆盖全球53个国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3%的受访者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

这份调查反映了广大海外民众的真实心声。“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50多个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占比高达85%。”据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辉解介绍,目前全球超过8亿人面临饥饿,3.5亿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救援,“对这些人权和国家来说,生存权、发展权当然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李云龙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然而,西方人权模式并没有推动全球人权稳定发展,多数采纳这一路径的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甚至出现倒退,生存权、健康权和教育权都得不到保障,政治动荡和地区冲突不断,“显然,西方人权路径失败了”。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减贫保障民生生存权、发展权的成就有目共睹,2013年至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年均减贫1237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1.3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2022年10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七成。与会者认为,中国的脱贫成就,对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权事业发展而言都是重大贡献。

加蓬司法、掌玺、人权和性别平等部部长埃尔莉莉·达马斯第一次来到中国,一有空她就会到处转转。“据我观察,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是很幸福的。”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中国在人权领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从北京举办奥运会那一年起,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就开始了在人权事业领域的交流往来。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立法法院第一副院长、国家人权中心主任阿克马尔·赛义多夫参与了中乌人权合作的许多重要时刻,也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成就的见证者。

“我们既向美国和欧洲学习人权发展经验,也向中国学习人权发展经验。但对我们来说,中国的经验更值得借鉴。因为我们都是亚洲国家,更倾向于用集体主义思维解决人权发展问题。”在日前举行的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期间,阿克马尔·赛义多夫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之一,1992年与中国建交。从2008年开始,两国加强了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乌兹别克斯坦每年都派代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人权论坛,赛义多夫就是其中一名代表。

“从那时起,我们就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人权发展经验。每隔两到三年,我们都要把中国经验纳入新的国家行动计划中。”赛义多夫说,“每一份行动计划都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制定,为下一阶段的人权工作指明了方向——或是人权教育,或是消除贫困,或是打击腐败。”

2013年,中乌签署《中国人权研究会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人权中心合作谅解备忘录》。2020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制定了第一份国家人权战略,成为该国人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赛义多夫表示,这份战略的出台,离不开中国的经验和智慧。

十几年间,赛义多夫目睹了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见证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就。在他看来,消除贫困是中国最重要的人权成就,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一个目标,对世界上所有国家树立了好榜样。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一个目标就是消除全世界范围内一切形式的贫困。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兼报告员阿斯拉·阿巴希泽高度肯定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作为国际法专家,他特别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国际法应建立在共同协商的原则之上,以包括“人权”在内的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或推行单边霸权,都是不可接受的。

2021年2月,中国宣布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消除了贫困,比联合国设定的日期提前了10年。阿巴希泽说,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脱贫不仅是中国的成就,而且是对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在他看来,这一目标的实现证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个理念,更是一项行动宣言。消除贫困就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如何实现自身理念的过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标志着中华民族与贫困的长期斗争的终结。”

在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和受益者。阿巴希泽指出,中国的人权理念,与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中的理念不谋而合。宣言明确提出,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1993年6月14日,包括中国在内的180多个国家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成为世界人权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过去30年间,宣言激励各国不断探索有效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道路,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如今,全球人权治理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地缘冲突旷日持久,阵营分化愈演愈烈,南北鸿沟有增无减,气候危机日渐逼近,加上美西方持续选择性地将人权武器化、政治化、工具化……全球人权治理面临多重严峻挑战。

的诸多成就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加纳驻华大使馆公使阿布·欧苏曼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通过消除贫困改善了人权状况,提升了人的尊严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表示,如今儿基会与中国合作重点,已经从儿童的生存需求向更高层次的需求转变。

“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脱贫目标,为世界树立了好榜样,并促使其他国家重新思考实现发展权的路径。”赞比亚学者弗雷德里克·姆泰萨说。

## 中国推崇“众生平等”理念

“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优于采用西方发展模式的国家,因为这两种模式在人权认知上有巨大差别。”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指出,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把消除贫困视为享受人权的阻碍。“作为文明古国,中国认定消除贫困是核心人权,并付诸坚定而广泛的实践,因此在消除贫困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中国工作、生活了30多年,走遍中国各地,对中国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山村的现状有深刻了解。“真正的民主用来解决人民想解决的问题,中国通过多种制度和渠道集纳民意、制定政策,有效促进了人权发展。”在他看来,“与西方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具有更重大、更广泛的义务”。

“西方人权模式与中国人权模式最核心的区别,是对‘众生平等’理念的态度。”意大利民主与促进中心联合主席米凯拉·阿里卡莱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西方社会建立在‘不平等’之上。

一些人则是剥削者,另一些人就必须是被剥削者,如此才能推动资本主义的运行。与之相反,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一切的基础。”

“西方强调自由是最大的人权,东方强调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孤立存在,将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白帆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总结道。

## 西方对中国漫长的历史缺乏理解

作为《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不但通过本国人权发展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大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权发展新范式,还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

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已加入了26项重要国际人权公约。中国还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例,10年来,倡议为沿线国家创造了42万个工作岗位,帮助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在与与会者看来,这是通往和平之路、消除贫困之路,也是实现人权之路。

“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实践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有借鉴意义。”美国社会学家马可·立文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亚投行等多边机制,都是全球发展倡议理念的体现。

中国不但积极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中国是推动世界人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真正做到了以和平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新华社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叶书宏说道。

## 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第一副院长、国家人权中心主任阿克马尔·赛义多夫：

## 中国的人权发展经验更值得借鉴



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第一副院长阿克马尔·赛义多夫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

权”之名对中国的抹黑攻击从未中断。2021年年底,拜登政府通过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禁止任何新疆产品被进口到美国,除非相关企业能证明产品不是“强迫劳动”的产物。

在赛义多夫看来,这些招数并不新鲜。“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西方国家就对中国发起攻击,企图破坏北京奥运会举行,理由是所谓的西藏和新疆人权问题。实际上,美国自己也有很多问题,如种族歧视、监狱丑闻等。”赛义多夫指出,每

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就,也有待解决的问题,不能将所有问题都归于“人权”,并以此为由对他国横加指责和干涉。

在制定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向东看”也“向西看”,希望吸收所有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但赛义多夫认为,中国的人权发展模式更具吸引力,因为中国的人权理念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更清晰、也更熟悉。“乌兹别克斯坦是亚洲国家,不是欧洲国家。在欧洲,人们更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

##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兼报告员阿斯拉·阿巴希泽：

## “人权”不是干涉他国内政或推行单边霸权的借口

发展要以人为本,确保人人自由、积极而有意义地参与。

近年来,美国经常以“人权”为由,在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2021年,美国政府通过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禁止新疆产品进口;2022年12月,美国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非法制裁中方官员;2023年3月,美国务院又发表所谓“2022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抹黑香港人权法治状况。

在阿巴希泽看来,这些指控完全站不住脚。他列举了一串数字:2016年至2020年,中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及贵州、云南、青海3个多民族省份累计减少1500多万贫困人口,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这些统计数据有助于我们评估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你可以不喜欢中国,但你不能否定中国的成就。”

中。一些国家企图以所谓‘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名,将世界一分为二,这是一种双重标准。如果它们想跟中国合作,就应该认可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尊重中国的平等、独立、文化和传统。”

美国还以“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由抨击中国,给中国贴上“规则的破坏者”“秩序的颠覆者”等等标签,拼凑“奥库斯联盟”(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各种“小圈子”,在国际社会上挑起所谓“意识形态”对抗。

“什么是国际法的规则?国际法规则的本质是建立在国际协议基础之上的合作框架,是各国共同同意的结果。国际人权体系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而非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家法’、‘帮规’。”阿巴希泽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才是独裁行为,这不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实施这种行为的不是中国”。相反,日本在美国的默许下准备将核污水排放入海,才是“违反现行所有国际法的行为”。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是出于恐惧和无知。”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劳尔指出,中国对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全球发展观,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自然形成的,西方对这样漫长的历史缺乏理解。“在西方哲学观中,人的本质是邪恶而自私的。因此,他们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丛林法则’。”

## 人权不是推行霸权的幌子

当中国通过促进安全与发展来推动国际人权事业时,一些国家却打着“人权”旗号干涉他国内政,施行单边霸权。英国政治评论员卡洛斯·马丁内斯谈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遭受过美国的军事干预,如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中国却坚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全球军事冲突”,并为那些饱经战乱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西方在全世界发动战争,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叙利亚总统特别顾问布赛纳·夏班说,“战争直接侵犯了我们的人权,也使我们的社会更加脆弱。”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爱德华多·佩维达说:“中国使1亿多人口摆脱极端贫困,一些国家却以‘反恐’为名剥夺生命。这些国家为什么不能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做些实事?”在法国《自由思想》杂志主编让-皮埃尔·帕吉看来,西方国家越来越背离《联合国宪章》宗旨,“发达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将一些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限制了它们的发展,侵犯了人权。我们迫切需要新倡议和新机遇来改变旧有的霸权规则。”

多名与会者都提到,今年3月,沙特和伊朗这对“冤家”在北京达成历史性和解,正是中国通过和平努力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全球人权发展的生动实践。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诗杰指出,七国集团对伊朗挥舞制裁大棒,将中国描述为“全球威胁”,中国却促成了沙伊复交,“美国及其盟友真该好好反省自己”。

“我们正处于最差的时代,因为我们目睹了太多将人权作为‘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霸权行为;我们又处于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看到了对霸权主义发起的挑战。”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委员克里斯潘·卡赫卢说,“中国成功斡旋沙伊复交的事例表明,中国必须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社会和政治制度。”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

主义;在亚洲,我们有更深厚的集体观念和家庭观念。因此,我们更倾向于用集体主义思维来解决人权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进入21世纪后,乌兹别克斯坦又一次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今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中国与中亚五国发表《西安宣言》,表示将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为新起点,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亚五国各自的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一带一’倡议是对伟大丝绸之路的革新,乌兹别克斯坦完全支持这一倡议,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合作。中国与中亚有着3000年的文明交往史,合作的基因镌刻在我们的文明之中。”赛义多夫谈到,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乌兹别克斯坦受益良多。乌兹别克斯坦是内陆国家,“一带一路”促进了中亚五国互联互通,使其从“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并为乌兹别克斯坦开启了通往贸易港口的大门。

对于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理念,赛义多夫也深表认同。在他看来,安全与和平、可持续发展、全球人权治理,是推动人权发展的三大支柱。

“没有安全与和平,我们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能取得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进步,不可能改善人权状况。”赛义多夫说,“今年正值《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处于新的时代,我们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战略。在推动安全、发展和人权治理等全球问题上,中国是一个好榜样,我们应与中国通力合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 对此文亦有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贺彼得一开口说话,就能让人感觉对他中国的了解不一般。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会“一点点”中文,又会在对话中频繁使用“贵国”这类敬语,用“唠嗑”来代替“聊天”。他还能一字不差地引用孔子的名言——“有教无类”。

作为瑞士汉学家、历史学家及瑞士驻华大使馆前武官,贺彼得与中国的缘分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他对中国的认识,起源于中学时期收集的一套与中国有关的邮票,票面上是他不认识的中国历史人物,让他萌生了好奇之心。恰好在当时,东德引进了一些介绍中国历史的译本,其中,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引起了他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上世纪70年代初,他考上了苏黎世大学,开始学习中文。

1950年,瑞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然而,建交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往来畅通无阻。1973年,一家瑞士旅行社组织青年学生来华旅游。贺彼得听到消息后也想参加,但旅行社告诉他,“这么多人排队想去中国,你还得等两三年”。一气之下,他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文教部门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抱怨说,“我已经学了两年中文,但我连去中国的机会都没有”。然后,这个旅行团里就有了他的名额。

贺彼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旅行的路线:从香港入境广州,然后到上海、苏州、南京、西安,最后到北京。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贺彼得所见的是一个跟如今完全不同的中国。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对中国的兴趣,从苏黎世大学毕业,他又到中国台湾继续学习中文,在那里半工半读,一住就是6年。

1980年,贺彼得又一次来到了与中国亲密接触的机会——有个瑞士驻华大使馆的朋友邀请他来北京玩。那时候,北京的路上还没什么汽车,满大街都是自行车。这位朋友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作为他的交通工具。“北京是自行车的乐园,因为都是平地,没有山。那时候,人人都骑自行车,而且骑得很慢。”

那个年代,一张白色人种的脸在人群中很是显眼。贺彼得记得,经常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这来,对他的印象如何,等等。如今他走在中国任何城市的街头,再也没人拉着他问这问那了。

1999年,贺彼得再一次来到北京,在瑞士驻华大使馆担任武官。这一回,他一待就是4年。在又一次的离开和归来中,他见证了北京的发展,从一个古都变成了“各方面都非常现代化的地方”。

近些年来,北京的变化更大了。以前他从飞机上往下看,天空是“灰色或者褐色的”,现在从飞机上往下看,“北京是绿色的”。以前行道树的树叶上蒙了一层颗粒,看不清底色,近年来叶子“越来越干净”。以前经常有沙尘天,出去走一趟,身上都是土,皮肤也痒,现在这些现象基本都已绝迹。

贺彼得也去过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哪个地方像北京这样给他强烈的归属感。离开北京之后,他又在东京当了4年武官。他不会讲日语,只有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人们才会说英语。在日常生活中,他很难与当地人流交流。他去过纽约,但纽约人“只有工作,没有生活”。在他去过的所有大都市中,他最喜欢的还是北京,“有一种其他所有城市都没有的气质”。

2008年退休后,他向瑞士同胞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每次讲完后都有人问,“你能不能组织我们去趟中国?”于是,贺彼得开始了退休后的“导游”生涯。每年他都要来中国一两次,每次的旅游团不超过10人,“慢慢地走,不要每天换一个酒店,才能深入了解中国”。他设计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北方线,包括天津、大连和西安。在天津,他带着游客去滨海航母主题公园;在大连辽东半岛,他们参观日俄战争的遗址,“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发生在第三方国家的国土上”。

另一条是南方线。在泉州,贺彼得给游客介绍郑和的宝船,讲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在绍兴,他们参观鲁迅故里。他这样描述鲁迅:“他是中国现代一个很重要的作家,是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想要在知识分子的能力范围之内改变中国。”然后顺势给他们介绍五四运动。在上海,他们参观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起源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两条线路走下来,贺彼德的客人们就对中国古代的史和近代史有了基本了解。

在贺彼得看来,中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脉络。“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语言,因此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不断。但中国一直都是一个文化统一体,无论哪个朝代都说同一种语言,而且有同样的文化。”他认为,这是中国和欧洲最大的区别,也是推动中国作为统一国家向前发展的力量所在。

贺彼得作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演讲,其中有一讲的主题是孔子与儒家思想。他认为,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有教无类”,“中国的儒家文化有一种强大力量,它不需要像西方那样到处传教,而是一种引人入胜自愿跟随。这也是中国成功的因素之一。”

并不是所有瑞士人都像贺彼得一样了解中国。他说,瑞士媒体对中国报道的“不太客气”,一方面,许多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冷战时期,认为中国强大后会成为西方的威胁;另一方面,大部分报道的作者并没有来过中国。

近年来,贺彼得在每次演讲中都会加上一句:“中国从来没有在海外开辟过殖民地,也从来没有入侵过哪个国家。”他希望让同胞们知道,中国是崇尚和平的国家。有些人会相信他的话,也有些人不信。“如果他们不信,自己调查研究就更好,就能证明我的话对不对。”